

【趣味阅读】

想象力凝结出的美丽误解

□刘星

法国医师安布鲁瓦兹·帕雷在1573年出版的《惊奇与怪异》一书中收集了各种奇异的动物、天文现象,有些来自前人的博物志、宇宙志和研究著作等等,有些来自当时社会流传很广的木刻版画,更有趣的是,他运用了当时欧洲的医学、生物学理论对这些奇异之物进行了诠释,这些内容在国内几乎是无人涉足的。

在这部书中,这些生物构成了奇异的景观,使人对当时欧洲的思维观念不由得好奇,这些想象中的动物的起源是什么?它们是如何演变成这种形象的?当时的欧洲人在这些想象中的动物上究竟投射了什么?这些动物形象反映了当时的什么思维和观念?怀着这些好奇的问题,我以安布鲁瓦兹·帕雷为基点,对同时代同类型的书籍继续探寻,由此我发现了康拉德·格斯纳、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等等博物学研究者,其中的一部分是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启示录式预兆,这一点和中国古代的观念非常相似,都是将奇异生物的降生或者怪异的天文现象视为上天对人类的警告,灾厄即将降临的征兆,不同的是在当时的欧洲,这往往成为宗教改革的宣传由头,并且还成功了,可以想象,这些亲历这个时代的人们时刻都被这些怪物降生传说所包围的盛景。

我还希望这是一本志怪之书,收集了人们在了解未知事物的途中,以想象力凝结而成的误解,并对这些误解进行深入浅出的挖掘,试图找出其背后的故事。

除了诞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怪物之外,还有一些怪物有着更久远的历史,追踪这些怪物在时间中的足迹,需要将时间上溯,来到中世纪,中世纪并没有它被冠以的名称那样“黑暗”,甚至文艺复兴也可以算作中世纪的一个时期,在中世纪有着各种有趣的事物,比如当时欧洲对东方的奇异想象,这些奇异想象聚集在《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旅行记》等等旅行志和“亚历山大传奇”“祭司王约翰的信札”等等传奇中,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东方生长着各种奇异的植物,有着各种形状怪诞的飞禽走兽,盛产奇珍异宝,也有不老泉等等神奇的事物。

大普林尼的《自然志》是欧洲众多博物志的鼻祖,不论是书籍的内容还是编撰的形制,都深深影响了后来者,在这本书中,他不仅仅收集了众多的神话传说,将这些神话传说中的生物和当时认知的世界地理进行了现实对位,还试图将一些传说进行理性的分析,给出现实可能的原型。虽然这些也是大普林尼从希罗多德等等

前人那里承袭而来,不过编撰出像《自然志》这样庞大、全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大普林尼可能还是首位。

和现代观念的不同,希腊—罗马在早期的一段时间里,和中东区域的交流更为紧密,它的神话也受到了来自中东的影响,比如爱神阿芙洛狄忒就诞生于中东,和两河流域神话中的印南娜—伊西斯等女神有着密切的渊源。而作为现代欧洲文化源头之一,和希腊—罗马并称为双希文明的希伯来—基督教文明也诞生于中东,深受当地神话的影响,与当地神话有着很多共同的要素,对一些古代存在的怪物进行追溯,可以在中东找到相关的传说。

这本书里的内容,不仅仅是关于怪物的,依然体现了人们的观念和认知,通过与我们自己传说、异兆中体现的思维对照,能够发现一些东西方共同存在的观念,大家都在相近的时间阶段里,对性质相似的事物,存在着同样的迷思,由此诞生了各种奇异的想象,而这些想象通过传播,留在了彼此的文献记载中。

比如中东传说中有一种叫做 waq-waq 的树木,它生长在世界以东的尽头,可能是中国或者日本的一个叫做 waq-waq 的岛屿上,一般认为它的树枝上长满了果实,果实是人类的模样,但是不具有灵魂和思想,但在和亚历山大有关的传说中,这棵树能够讲出人类的语言,预言了亚历山大的死期。这种树木很像《西游记》中所说的人参果,在《三才图会》中也有记载,受到中国的影响,日本也有类似的传说,他们称为人面树。

东西方奇异的传说会相互流传、演变,往往是西方称有奇异在东方,而东方称有奇异在西方,这里的想象内容虽然各有不同,不过想象的性质却是共通的,大家都是彼此的异域,都将各种光怪陆离设置在对方身上,互为彼此的对照和镜像。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人们将自己的足迹遍布到了整个世界,生物学的研究使各种动物的性状都不足为奇,过去旅游者的怪物见闻被人证伪,这些因为好奇心而诞生的怪物也逐步被人遗忘。但它们身上的那种未知的魅力并不会因此消退,所以我编撰了这本书,我之所以坚持以编撰者这个身份自居,是为了尽可能地让过去的作者讲话,通过他们的言语来讲述这些怪物,不是用现代的观念来解释、评判。这也是我所欣赏的约翰·阿什顿在他编撰的《奇怪动物百科》中所想所做的。



刘星著
九州出版社
《惊奇与怪异：
域外世界怪物志》



汪家明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爱看书的插画》



美凯文·库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旁观者：
一起改变世界的吉诺维斯案》

【读经典】

《傲慢与偏见》：
永不过时的生活

□汪家明

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这样的单身汉,每逢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虽然完全不了解他的性情如何,见解如何,可是,既然这样一条真理早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因此,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应所得的一笔财产。

有一天,班纳特太太对她的丈夫说:“我的好老爷,尼日斐花园终于租出去了,你听说过没有?”……

《傲慢与偏见》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小说的基调也就这样定下来了:轻松、风趣、从容,铁了心要讲好听的故事,不怕你不读下去。

故事发生在距今整整二百年。在离伦敦几十英里的一座镇子上,一个家庭,父亲、母亲和五个女儿。记得小时候我读到二女儿伊丽莎白在舞会上,一方面受着达西傲慢的伤害,一方面为母亲和妹妹俗不可耐的做派懊恼,可是以她善良的本性,又无法责备、怨恨家人时,我的心同样在受着煎熬。这是对人性的拷问,这位美丽清高的女子就是在这场不断的拷问中越来越闪出光芒,牢牢抓住了我的心。书中对话连篇,可以说整个故事和人物性格都是靠对话刻画出来的。这些对话是何等迷人、妙趣横生啊,处处隐藏着机锋,话中有话,对每个人而言又都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比如父亲班纳特先生,他总喜欢说反话。大女儿吉英失恋后,他对二女儿说:“我倒要祝贺她。一个姑娘除了结婚以外,总喜欢不时地尝点儿失恋的滋味。那可以使她们有点东西去想想,又可以在朋友面前露露头角。几时轮到你头上来呢?你也不大愿意让吉英超前太久吧。现在你的机会来了,麦里屯的军官们很多,足够使这个村子里的每一个年轻姑娘失意。让丰翰做你的对象吧,他是个有趣的家伙,他会用很体面的办法把你遗弃。”这位明智的、洞察世事的老先生很让我喜爱,觉得他的话句句中听,几乎忘记了这本是作者的把戏。伊丽莎白说起话来则尖刻泼辣又不失教养——这分寸把握起来挺难的。我猜想,伊丽莎白混合了作者本人的影子吧。

小时候读的那本《傲慢与偏见》出版于1955年,里面有40幅插画,是线条精细、流畅的铜版画,从中可以窥到遥远年代、遥远国度的风情。女子盖住脚面的长裙、长到肘部的手套、扎到头顶的卷发,男子的礼帽、燕尾服、竖起的白领、长筒袜或皮靴……还有像一只写字台的钢琴、小小的单屉桌,像奥运会奖杯一样的器皿,以及在起居室里大家怎样谈天,绅士见了小姐怎样鞠躬、吻手等等。伊丽莎白的确很美,标致的脸蛋和身材,胸前还系了一个蝴蝶结。据译者王科一写的“前记”,画家名叫勃洛克,这些插画作于1895年。

20世纪70年代末,在大学里重读《傲慢与偏见》,我注意到作者津津有味地讲述庸常生活中的细节,似乎毫不费力。她对平凡生活中的人情世故的参悟已经入木三分。她善于表现这样一种境况:读者已经明白事情的原委,明白各种偏见、误会的严重性,可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却浑然不知,硬是向悲剧的结果走下去,让我们干着急。据说,奥斯丁是英国文学中第一个以描写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作家,是一个典型的“风俗作家”。后世有人指责奥斯丁的小说没有反映伟大时代,晚奥斯丁一百年的女作家伍尔芙却说:的确,奥斯丁的小说里“没有什么悲剧,也没有什么英雄壮举。然而,不知为什么,与表面上那种隆重气氛极不相称的是,这个小小场面非常动人……表面上,她写的是区区小事,然而这小事又包含着一点儿什么——它在读者心中扩大发展,变成具有永恒形态的生活场景”。有人评价奥斯丁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结构匀称,整体看来没有任何滞碍。伍尔芙说:“她在多种才能之间能够保持一种非凡圆满的平衡,凡是她完成了的小说都没有败笔,也没有哪一章写得不如其他各章。”甚至有人说,《傲慢与偏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是小说原本含义的表达。它未受任何小说理论的污染,目的纯正,就是要讲述一个好听而且表述巧妙的故事。

(本文选自《爱看书的插画》)

【历史重现】

人类道德是否容得了旁观

□秋华

在一些公共性案件的媒体报道中,除了受害人和施害者,往往还有一群人会进入公众视野,就是旁观者。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可避免或主动或被动地充当过旁观者的角色。对于旁观者,是否用一般的道德审判,诸如自私冷漠,就可以解释?旁观者应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公民责任?旁观者面临的困境又是什么?《旁观者:一桩美国凶杀案的现代启示》一书通过重新讲述50多年前轰动全美的一桩案件,为人们思考旁观者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

1964年,美国纽约市年轻女子基蒂在自家门前被人用刀捅死,犯罪过程共持续33分钟,28岁的受害者基蒂全身13处穿刺伤,凶手往返两度追杀基蒂,三次拿刀捅向她。《纽约时报》随后刊发头条新闻,宣称在案发过程中共有38人耳闻或目击凶案发生,但均未报警,引发全美对于都市人情冷漠的大讨论。人们将本案视为一则现代都市人情冷漠的寓言,纷纷指责报道中提及的38个未向受害者基蒂施以援手的证人冷漠无情、道德败坏。就这样,旁观者这一群体被推上了道德审判台,几乎第一次占据了有关案件的舆论焦点。

在此后的50多年中,基蒂的遭遇被人搬上荧幕,写入歌词,案件中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不断隐晦地出现在各种影视剧和真实案件改编的故事里,吉诺维斯案在美国成为家喻户晓的案件,从未淡出公众视线。而每当类似案件发生,对于旁观者的谴责声也始终不绝于耳。

多年后,作家凯文·库克通过警察局档案、庭审记录和自己的多番追索和走访,逐步还原了基

蒂案的细枝末节,并指出《纽约时报》为追求新闻点,对报道中所涉的细节多少做了不实的处理。比如有些所谓的“旁观者”是因为将罪案误解为一般口角,或被害人走出视域不知所踪而没有报警。清楚了解正在发生的一桩凶案并袖手旁观的严格意义上只有两个人,而非报道所称的38人。在《纽约时报》炮制的“38个旁观者”中,固然有少数真正胆怯和冷漠之人,但也有人报案,还有人冲出自己的居所守护垂死的受害人基蒂。

基蒂案恰恰是纽约犯罪率飙升的序幕。这一案件本身,也为美国建立良序社会做出了一些贡献,比如直接促使911报警系统、社区互助组、好撒玛利亚人法案等的建立,并促使一些美国人为了避免基蒂案悲剧的重演,在危难面前,主动挺身而出。

在很多案件和生活中的一些突发事件里,既非施害者,又非受害者的过路人群,广义上说,都可以被笼统地称为旁观者。旁观者原本是个很中性的词,旁观者的表现,往往有好有坏。《旁观者:一桩美国凶杀案的现代启示》一书启示我们:旁观者这一被推上道德审判台的人群,是否可以在法理、人情、伦理、公民社会责任的角度,被重新讨论?学者许纪霖推荐《旁观者》一书道:“在突如其来的陌生人的苦难面前,人类的道德是否容得了旁观?本书所描述的吉诺维斯案,读了令人震撼。每个人或许都应该自问:假如身临其境,我会怎么做?这里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只有人性中光明与幽暗互相纠缠。是的,神性与魔性,是心灵深处永恒的战争。”